

## 壹、前言

現代社會重視在服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整體的繁榮與個人的幸福，而個人的幸福則多以較高的地位與權力、豐富的物質生活為評量標準。處於這樣的社會氛圍，再加上現代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為了培育更多具競爭力的人才，透過市場化機制左右學校教育的方向，使得學校教育、教師、學生及家長莫不希冀以良好的學業表現考取明星學校科系，以確保未來在經濟領域握有較佳的就業機會，進而擁有成功的人生（Conroy & de Ruyter, 2009: 1-2; Lawn & Ozga, 1981: 132）。於是，升學主義與市場化導向的教育簡化了選擇的多樣性與認識差異的機會，因為擁抱主流價值是教師與學生安全感的來源。但是，過度追求工具性、外在性目標，將使吾人不僅在學習或是與人交往互動上愈益依賴工具理性思維，亦使得教育場域的參與者，尤其是學生，逐漸喪失活力與意義感，以及與他人穩定且真誠的交流。尤有甚者，因無法自結構既有之價值體系中獲得共鳴，於是產生疏離感、虛無感，甚至失去對自我的肯定與對生命的熱忱。

然而，人類原有多元的渴望，除了希望擁有不虞匱乏的物質生活、享有世俗的名利與成就之外，也渴望經驗生命力的昂揚與情感的交流，甚至渴求與某種超驗性力量接觸，以獲得雋永性的意義，藉此使生命趨向圓滿。除此之外，人類亦具有多元的能力，包含理性、邏輯、直覺、同理、情感、想像、創造等。既然如此，教育過程中必須幫助學生發現生命的多樣面向，由此促進人性的完整性，並提供機會使其看到主流外其他重要的意義與價值、發展其探索與思考生命意涵的能力，進而逐漸尋找到能與自己產生深刻共鳴的價值與目標。而人性完整性的圓滿與生命意義的獲得即為生命教育的目標。當代哲學家Charles Taylor（1931-）透過歷史的研究，為我們指出現代人之所以會如此重視社會秩序、服膺主流價值觀，以及強調工具理性的原因之一，乃在於從「具魅世界」（the enchanted world）到注重紀律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失去「反結構」的精神。於是，本文希冀透過對Taylor思想的探究，一方面藉由耙梳與分析這一歷史發展，體現靈性傳統之一「反結構」的價值與現代文明的特質與認同問題，另一方面企圖以Taylor對「反結構」之詮釋，指出生命教育在以工具理性為導向

之教育中的重要性，並提供可行的實踐模式。

## 貳、「滲透性」認同

《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Source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在Taylor的學術歷程中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它除了是Taylor在這之前對人類主體研究的成果外，Taylor在該書還以歷史研究與哲學分析的方式，體現現代人類自我認同的根源及其問題；此外，於書末他對人類自我根源與超驗性力量有某種關係的直覺（hunch），預告了他在這之後將重心轉向現代宗教與靈性的研究，以及對現代人靈性的關懷，而《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即是Taylor靈性思想的集大成。

在《世俗時代》這本巨著中，Taylor指出古代社會是一個具魅世界，當時人們相信世界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力量，有上帝、撒旦、惡魔，還有讓人類生病或死亡的魔法毒藥等。當上帝的仁愛為人類帶來善事物及安好生活的同時，邪惡的力量則威脅人類生活，而當時的人相信，對於上帝的信仰與完全的奉獻，能使我們免於後者的傷害。其次，神聖的力量不只來自上帝或精靈等能動者（agents）<sup>1</sup>或是主體，亦存在於物體上，例如聖者的遺骨、遺體或其使用過的物品等，這些物品是靈性力量的所在（Taylor, 2007a: 32），在具魅世界中，生命意義便是寄託在這些神聖物體和能動者身上，人類的存在與否並不會改變它們的意義。因為這些能動者及力量，與人類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滲透的（porous），所以它們能輕易地將意義傳達並加諸在人類身上，或是帶領人類到它力量所及的領域當中（Taylor, 2007a: 33-37）。

人類曝露在這樣充滿善力量及惡力量的世界是脆弱且易受影響的，既能受到善力量恩典的保護，也會受惡力量的侵擾而產生如同著魔般的行為。因為人類心智和

---

<sup>1</sup> 參照余紀元（2001: 32），“agent”來自於拉丁文中的“agens”，意指「作為行為主體的理性人」。“agent”「能夠決定是否行動，一旦決定行動後，亦能深思熟慮如何行動；而確定行動的途徑與手段後，能進一步實踐以造成某種變化。」這些能力稱為「能動性」（agency），不同於該辭典將“agent”翻譯成「行動者」，作者欲強調“agent”除了具備這些「能力」且能主動行為，故將之翻譯為「能動者」。